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当代教育论丛

寻找把教育学 托上天空的彩云

XUNZHAO BA JIAOYUXUE

TUOSHANG TIANKONG DE CAIYUN

◆ 王炳照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当代教育论丛

寻找把教育学 托上天空的彩云

王炳照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王炳照著.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0
(中国当代教育论丛)
ISBN 978-7-107-22944-2

I. ①寻…

II. ①王…

III. ①教育史-中国-文集

IV. ①G5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131118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pep.com.cn>

北京人卫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 240 毫米 1/32 印张: 24.875

字数: 610 千字 印数: 0 001~2 000 册

定价: 43.80 元

《中国当代教育论丛》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进行，我国教育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教育理论界不少学者在理论研究与学术实践中进行了艰辛的思考与探索。他们学风正派，治学严谨，几十年如一日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坚持科学精神，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们的精辟见解大都集中反映在凝聚着他们心血的一部部鸿篇巨制和大量学术论文之中。

系统地、科学地总结五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教育理论的研究成果，这对于廓清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精华，揭示规律，为今后的教育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促进新世纪教育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组织编辑了这套《中国当代教育论丛》，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资助出版。这套《论丛》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已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这套《论丛》各卷的作者大多数是新中国第一代教育理论家。在长期的教育科学研究中，他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术思想开放，工于学理分析，尽可能地揭示教育的客观规律，促进教育学科学化是他们不懈的追求。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始终关注着现实的重大

教育问题，或系统阐述，或直书议论，或发表评论，或提出商榷，撰写了一批对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专著及论文。这些专著和论文荟萃了我国教育理论研究的精华，折射出我国老一辈教育家对教育改革的艰辛探索与奉献。有的论文提出了不同的学术观点，甚至尖锐对立的学术观点，我们相信，实践会作出检验，时间会作出评判，读者会作出思辨。

这套《论丛》主要采取论文选辑的形式，每人一卷；收入的选文精选自著者发表过的有关论文，并附有题解；各卷的选文主题相对集中，一般按发表的时间排序；出于种种考虑，我们对每卷篇幅有所限制，对有些内容不得不忍痛割爱，这是需要向作者和读者特别说明的。

这套《论丛》的选编、出版，是我们系统总结新中国教育理论学术成果的初步尝试。教育学术界学者以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给予了热情关注，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各卷作者付出了辛勤劳动。人民教育出版社一贯以教育事业为重，以学术为重，给予了大力支持和资助。对此，我们深表谢意。限于水平，这套《论丛》的编辑、出版工作中存在的不妥和不足，敬请读者不吝指教为感！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

2001年10月

序

炳照走了，好似不辞而别地走了。因为他走得如此突然，那么仓促，我们没有来得及话别，没有来得及再叙叙旧。炳照常称我为老师，其实我哪里是他的老师，而是同学，是同事，是朋友。只不过我比他年长几岁，早几年毕业而已。我认识炳照是在1962年我从师大附中调回师大，他正在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学习的时候。我因为在师大只上了两年学就到苏联去了，没有学过中国教育史，因此就到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去旁听。所以我说与炳照是同学，一点不假。炳照毕业后就留在教育系，我们又是教育系的同事，一直到他走的那一天。其间我们又曾同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每次开评议会他都帮助我做许多工作。他还帮助我编纂《中国教育大系》、《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我们两人的情谊岂能用同学、同事、朋友几个词说得清楚！

炳照是我国新时期中国教育史学界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人物。他师承毛礼锐、陈景磐、陈元晖、邵鹤亭、瞿菊农等老一辈教育史学家。“文革”以后，他接过这批老先生的班，大力开拓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他先后主编了《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等专著，又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的编纂工作。他对我国古代私学、书院和科举制度又深有研究。他不仅研究中国教育通史，而且还拓展了区域教育发展史和教育论争史的研究。他对教育史学理论也有较深的研究和独特的见地。

他坚持教育史研究中“古为今用，以史为鉴”的史学原则。他认为研究中国教育思想史就是要“探寻教育思想产生、发展及其演

进的历程，挖掘历代教育思想的丰富内涵，总结前人认识教育现象、指导教育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揭示教育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研究中国教育制度史“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历代教育制度作出历史文献史料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应该在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上教育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历史时，回答教育制度作为一个历史存在物的存在特性，及其与现实存在的教育制度之间的关联，探讨现代教育问题的历史根源”。

他在教育史学研究中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倡导实事求是和推陈出新。例如他对待传统教育持两点论的态度，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具有鲜明的二重性，“传统教育重视德育，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素养和文明程度，形成了多方面的传统美德，同时又强化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勒紧了四大精神枷锁”。他认为只有坚持两点论才能认清传统教育的本质，才能正确处理传统教育与教育现代化的关系。

炳照虽然是研究中国教育史的，但他一直关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现实。他对基础教育，特别是师范教育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撰写了一些很有影响的论文。直到他去世前夕，他还对当时国家制订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作为国家重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炳照不仅组织开展了中国教育史多领域的研究，而且培养了二十届博士研究生，有近五十名学生获得博士学位，为中国教育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炳照为人达观、率直、诚恳，乐于助人解困排难；治学严谨、慎思、笃学，勇于探索学术创新；为师以身作则，诲人不倦，善于启发诱导。他为教育史学的发展和人才的培育，特别是中国教育史学体系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编辑出版炳照的教育文集《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不仅是对炳照的最好纪念，也是丰富中国教育理论宝库的善举。读者一定会从他的论文中学习到他的道德文章。正是：

自序

早在几年前，陆续有出版社找我，说要出版我的论文集，我都婉言谢绝了。我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虽写过一些文章，编过一些书，主持过一些课题，但还谈不上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去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各行各业都兴起了“反思改革开放30年”、“回眸新中国60年”的热潮。我也先后承担了《中国教育改革30年·基础教育卷》和《共和国教育60年》的主编工作。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感觉这种总结还是很有必要的。吕达和刘立德同我谈起过，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与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在联合组织编辑出版新中国教育学专家自选集《中国当代教育论丛》，我认为很有意义、很有必要。6月中下旬，立德告诉我将我的论文自选集列入出版选题计划，而且已和施克灿、周慧梅进行接洽，准备协助我将我的有关文章汇编成书。不久，看到了他们整理出来的论文集目录初稿，我进行了调整改定。我觉得这本论文集是对我自己几十年来求学、治学的一个小结。趁此机会我谈一点自己的感受，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我的求学之路

我是一个农家子弟，1934年12月15日出生在河北景县的一个小村子里，父母都不识字，是一系列带有偶然性的巧合促成了我的求学之路。如果从六岁进入半私塾启蒙开始，到1964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班毕业，断断续续，我的学生生涯长达二十三年

之久。

父亲是个普通农民，排行第二，没有上过一天学，也没有什么手艺。大伯膝下无子，按照农村风俗，我便被过继给大伯，成为长房长子。我六岁时，和村里大部分同龄孩子一起，被父亲送到了村东头的小学读书。实际上，这所小学是个半私塾性质的，是由私塾改良而来的。老师就是原来的私塾先生，他到县简易师范学校学习了两个月，混了个“出身”，便成了这所小学唯一的教师。老师对新式教学法、体育一知半解，糊里糊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基本采用的还是原本私塾的教学方法。所以，我头两年的读书生活便是在这样的“之乎者也”、摇头晃脑中读书、描红中度过的，对于自然、科学，是一窍不通。家长们却没有什么意见。

第三年，从县里派来的新式师范学堂毕业生代替了老秀才，废除了描红，开始学习“小猫叫，小狗跳”，体育、音乐课程也像模像样地开设起来。体育课由教国文的男教师兼任。家长对他们的到来以及新的课程、教法很摇头，我们小孩子却喜欢得很。

当时采取的是“六三三”学制，小学阶段分为初小四年和高小两年。初小毕业后，我开始面临第一次人生选择。当时，村里初小的二十多个孩子，有五个孩子考上了高小，我是其中之一。此时，我已经十多岁了，同年龄相同家境的孩子已开始随大人下地干活了。当时大伯的意思是认识几个字就行了，庄户人家的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吗？于是我便开始下地干活，但一天下来的风吹日晒，我的皮肤上长满了水泡，我咬牙坚持，第二天、第三天……一周后，浑身上下长满了水泡，一层层地蜕皮，痛苦不堪。干农活，哪里有遮风避日的地方？无奈之下，父亲和大伯商量：“这孩子不是种田干活的材料，让他再上几年学，多认几斗字，将来也好混口饭吃。”就这样，我得以到邻村读完高小。

高小毕业后，因为县城没有初中，我投考了冀县和南官的两所县级初级中学。我的运气不错，两所学校都上榜了。但当两张录取

通知书真正送到家里的时候，大伯却坚决反对。到外县去上学，且不说要预备单独铺盖的困难，单说离家越来越远，考上学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假设考不上学，那白读几年岂不是瞎耽误工夫？即便回来也毁了，读的那些书在农村完全派不上用场，还不如早点长点本领。父母觉得大伯的话很有道理，便决定让我跟从舅舅学习木匠活。正当我准备做木匠学徒的时候，一场洪水却成全了我继续读书的梦想。突如其来的洪水将地里的庄稼冲个精光，家里粮食顿时紧张起来。这时候，每个月有60斤小米供应的初中生待遇，就有了相当的吸引力。家里人一合计，大伯最后拍板决定：“吃你那60斤小米去吧。”

我选择了冀县初中，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离家相对较近。冀县中学不是完全中学，只有初中部。按照老解放区的模式，采取配给制，每月的60斤小米一半用作膳食，一半作为服装、文具和日常用品开支，家里不用出钱。

就这样，从初中开始，我便在国家资助的情况下读书，不再花费家里一分钱，实际上家里也没有那样的“闲钱”供我读书。在旧中国，对于一个一贫如洗的农家孩子来讲，没有钱而能进一步读书绝对是连想都不敢想的。所以，我常常半开玩笑讲，我的求学经历本身就是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是各级政府严格贯彻“教育向工农大众开门”方针的受益者。

初中毕业时，我们这种配给制的学校被要求只允许报考中等技术学校。此时父亲才去世，身为家中长子，从情感和责任上讲，我都希望自己能早点挣钱养家，我选择了河北省建设学院财经部（后改称河北省保定财经学校，以下简称财会学校），学习会计专业，学制两年半。1955年2月，我以全优的成绩，被分配到石家庄地方国营棉织厂，在财务室做出纳工作。工作刚几个月，厂里要精简行政人员，而当年高考生源不足，国家鼓励社会青年以同等学力参加高考。就这样，厂里默许我们几个年轻人在不耽误工作的情况下

“备考大学”。8月份，我居然收到了北京俄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的录取通知书。

1955年9月，我背上简单的行李，带上从二弟身上脱下的半旧的中山装式灰色棉衣，还有母亲熬夜赶制的两双布鞋，到学校报到。俄院当时设有一部和二部。一部是培养国内紧缺的俄语教师和翻译专门人才；二部即为留苏预备部，专为准备留苏和留东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而设，在校进行一年的俄语和政治学习。我进入的是一部，四年制师范翻译系。实际上，该系是当年7月份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俄文系师生约400人全体并入，成立了师范翻译系，赵辉任系主任。该系理所当然延续了原有传统，所以我们班是俄院招的第一批学生，但上面却有二年级、三年级和四年级。

学校聘请了一部分教学经验丰富的苏联语言专家担任我们的教师，苏联专家鲍米诺娃、马蒙诺夫、毕丽金斯卡娅等人先后到校任教，我们也或多或少听过他们的课。后来由于人员不足，又从当时在北京工作的苏联技术专家的家属中聘请了一部分人来讲课。

学习生活是十分紧张的，核心是俄语和政治学习。俄语学习，对于我这个没有任何俄文基础的社会青年是个很大的挑战。对于外语学习，我只有在初中三年的英语经历，这种经历却成为俄语学习的障碍。由于习惯了英语的发音和拼音，学了好几个月俄语总是别不过来，两种语音总在脑袋里打架，好不容易想清楚了，说出口却是另一回事，好几次惹得全班哄堂大笑。我就暗下决心，要下更大的工夫去赶上班上同学。这种努力犹如一场长跑比赛，差不多半年后才有了明显的效果。

除去专业课程，我们还有礼仪实践课，每周一次，学习如何打领带、穿西服，品红酒、吃西餐，还有外交礼仪。领带和西服都是学校公用的，上课前按照自己尺寸向教务处服装室借出西服和领带，下课后马上归还。红酒和西餐平常上课全是虚拟的，只有在最后一次课才进行具体实践，然后就是考试。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

很多有趣的故事。如品红酒，平时上课就是举个空杯子，想象着里面装有浓香醇厚的高档红酒，跟着老师在那儿瞎比划，如何轻轻转动酒杯、如何加冰块、如何敬酒、如何干杯等等。我们班大部分同学来自农村，哪里见过这种阵势，任凭老师怎样讲，也很难进入状态。后来，我灵机一动，凉水我们不缺乏啊，就快点将这个“重大发现”告诉给同学们，大家都说这个主意好。等下一次上课，老师看到我们都举着半杯子凉水，先是一愣，说我们胡闹，凉水如何能模拟出浓醇红酒的挂杯情形，但限于资源，聊胜于无，老师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就这样，在凉水的帮助下，到期末真正用上红酒时，我们居然是不慌不忙，动作完成得有模有样。

1957年，中苏两国关系渐趋冷淡，不仅留苏预备部的辉煌不再，当年在留苏预备部学习、准备出国攻读大学本科的学员，全部没有派出，我们一部也受到了牵连。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培养大量俄语人才已不再成为国内急需，当然也就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师资力量，按照上级指示，要对一部进行紧急“瘦身”。当时我们那一届有600人左右，学校动员我们转学，到更广阔的天地贡献我们的力量。当时，我可以选择北大、人大、北师大等在京高校文科专业。经过比较，我发现北师大的教育系是个好去处，因为院系调整后，教育系大师云集；更吸引我的是，好像很多课可以自学，当时我肺结核病尚未痊愈，没有那么大精力选那么多的课程。在这种情况下，我办好了转学手续。

9月份，我和北师大1957年新入学的学生一起，成为教育系一年级新生，学校教育专业。进入师大学习，有一年半时光（即1957—1958年底）基本上是按照我原来的设想进行的：除了上教育系的课程，余下的时间再分为两块，蹭中文系和历史系的课程，基本上是“三分天下”。到了1958年“教育大革命”后，一场运动接着一场运动，正常的教学秩序就难以保证了。且不说“上课是为了批判”，“上完一门批完一门”，我们还“大搞生产劳动”：开辟了

试验田，种植蔬菜；砌起了土高炉，大炼钢铁；还办了一个玻璃丝工厂。至于到十三陵水库劳动，到生产队帮忙“抢收”，日夜连轴赶写“大字报”等“日常工作”更是不计其数，就谈不上什么学习了。

1961年我在教育系本科毕业时，学校正在筹办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班，我“服从分配”进入研究班继续学习。

中国教育史研究班是陆续“澄清”学科的成果。从1960年开始，在总结1958年“教育大跃进”的教训基础上，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指导下，教育部提出要恢复正常的教育秩序，学校开始将原来批判过的学科陆续地澄清。当时在北师大聚集了一批全国知名的搞中国教育史的老先生（大多在60~70岁，当时感觉他们年龄都挺大的），如邱椿先生、邵鹤亭先生、瞿菊农先生、毛礼锐先生、陈景磐先生等等。下边呢，虽然有几个年轻的教师，但他们都是从教育系本科毕业的，不是专门学教育史的，有点青黄不接，按照现在说法是学术梯队不合理。当时好像是中宣部提出来，要培养一批年轻的搞教育史的专门人才，目的就是逐步从老先生的手里，把知识接过来，传承老先生他们掌握的教育史知识。这些老先生尽管经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改造，但毕竟是解放前培养的人才，从政治思想条件来说，还难以适应新中国对这个学科的要求。另外，他们的年龄也偏高，需要培养年轻人来接班。因为教育史这个学科当时还比较特殊，这门学科需要很多专门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又是老先生们掌握得最多，于是组织他们办一个研究班，来培养一批人。记得当时有系领导对我们直接讲，你们的任务就是从那些“旧专家”那里学本领，要逐步取代他们，培养我们共产党自己的教育史学科的专门人才。就这样，北师大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得以创办。

就我本人来讲，我是不情愿进入研究班再继续学习的，一是家庭比较困难，想早点工作；再者觉得自己老大不小了，因为我是工

作一年多考的大学，且是读了六年大学，应该工作了。但是，从学校到系里，都反复动员我，最后直接说进研究班学习是组织上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服从组织分配，进入研究班继续学习，担任班长。

研究班采取导师制。当时北师大教育史教研室的五位教授，除去邱椿先生因年岁较大原因不愿带学生之外，瞿菊农、邵鹤亭、毛礼锐、陈景磐先生名下各分了4~5人，我被分给了邵鹤亭先生。上课方式是大课，按照教育史的传统分段，每位先生以自己所擅长或感兴趣的部分，从先秦两汉一直到近现代系统地讲，有点类似历史系上通史的课堂教学模式。研究班最先定位是以古代为主，所以最初被命名为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班。

就当时学习来讲，没有什么教材，不是不指定，而是根本就没有，国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1961年4月，在周扬的主持下，教育部会同文化部共同召开了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形成了《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学方针和教材编选工作的报告》。随之，教育部专门召开了一个全国文科教材建设会议，教育学科中的“中国教育史”被列入教材建设的重点教材，还成立了专门的教材建设小组。会后，教材建设小组按照学科优势，将中国教育史教材编写任务作了一下大概分工：按照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历史分期，由四所学校编写两套教材，发行全国。北师大独力承担一套教材，包括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共三本。为了编好这套教材，老先生们成立“中国古代教育史编写组”，6月中下旬，陈垣校长还专门邀请了首都高校中部分历史学界、教育学界的著名学者，如翦伯赞、范文澜、林砺儒等先生，向各位专家提交了《中国古代教育史》初稿（在《中国古代教育史讲义》基础上编写的），以此为基础，集中讨论中国教育史教材编写中的一些问题。我负责一部分专家意见的记录和整理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老先生给我们班上课时又增加了一个目

标，就是将教育史教材的编写工作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会议后，研究班的培养目标慢慢发生了转移，不再单纯学习中国古代教育史，而是根据教材编写的需要，近现代教育史都要学习。这样，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班的名字逐渐淡化，后来就直接称为中国教育史研究班。

为了完成教材编写的任务，老先生们的主攻方向进行了一次调整：邵鹤亭、瞿菊农、毛礼锐三位先生，负责中国古代教育史教材的编写，相应地中国古代教育史课程也主要由他们三位来上；陈景磐先生则重点承担中国近代教育史教材和课程。由于这些老先生中没人专门搞过中国现代教育史，现代教育史的课程一度搁浅。后来专门从中央教科所聘请了陈元晖先生（后长期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由他来承担教材现代部分的编写，同时为研究班讲授该部分的课程。按照学生研究专长和兴趣，重新调整了导师，拨出两个学生分给了陈元晖先生，我和何晓夏由此跟从陈先生学习中国现代教育史。

我们这个班，当时学习的时候，尽管还有很强烈的政治气氛，但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常好，没有因为政治运动来了，班上出现批判这个批判那个，同学之间谁整谁一下等等事情。大家都很怀念和留恋那几年的研究生生活。另外，学生们和老师的关系，很是温情融洽，毕业后大多长期保持联系。就当时政治要求上来说，那些老先生都是“资产阶级教育家”，我们这些学生却是党培养的新一代专业人才，好像应该和这些老师划清界限，保持一个距离，有一个界限似的。但在研究班上确实看不到这个界限，老师和学生谈问题、交往当中也没有戒心，学生也没有什么对老先生警惕之类的。所以后来说我们班“拜倒在资产阶级专家面前”之类，好像也没有冤枉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真心诚意向老先生学习。因为我们在本科时，看过的东西太少，知道的东西太少，和这些老先生一谈，他随时随地说的一个东西，我们都没看过啊，就想赶紧找来看看，无形中增长了我们的见识，老先生们起到了一个引路人的

作用。

在研究班期间，感触最深、收获最大就是在老先生指导下读了不少书，在图书馆抄了不少书，先后手抄过《古今图书集成》、《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著名书院志、蒙学读物、小说笔记和地方史志等约四百余万字。通过抄写，保存了文献资料，加深了记忆，锻炼了意志，还感悟出不少治学修身的道理。这些资料的积累，为我的治学探索之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研究班读书期间，我们又赶上了“四清”运动，我们由三年毕业也就变成了四年。先后两次“四清”，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等我们再次回到学校，已经离1965年暑假、离这一届毕业生毕业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学校觉得也不好再延长我们毕业，就要求每人都交一篇论文，没有履行答辩程序。完成比较早的，先提交给导师，导师提出一些修改意见；赶得比较急的，就直接交上去了。论文没有答辩，也没有说论文是否通过，没有考试，也没有什么结业仪式，而且毕业也没有证书（当时还没有学位制度，又不想仿效苏联授予副博士学位）。就这样，我们结束了四年研究班生活，匆匆忙忙、稀里糊涂毕业了。

可以说，我的求学之路上有太多的巧合，是一个又一个带有偶然性的巧合凑在了一起，构成了我长达二十余年的求学生涯。从高小到研究生，自然环境可以成为继续读书的理由，小到风吹日晒，大到天灾发洪水；国家教育政策、工厂内部调整可以成为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国际环境和外交关系也曾改变过我的求学方向；国内的政治运动也和我的学生生涯扯上了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无论高小还是冀县中学，还有我六年的大学生活，四年的研究班学习，等等，好多事情都是自己没有办法把握的。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讲，面对这些，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以坦然的心态，接受不能改变的现实，然后将事情尽可能做好。

二、我的学术探索之路

1965年毕业留校后，我被派往北师大临汾分校搞基建，很快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尽管我的出身“根正苗红”，没受到大的政治冲击，但在全中国一片混乱之中，高校里也没有什么正常教学了，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探索。1976年10月底，粉碎“四人帮”才半个月，我由教育系被调到学报编辑部做编辑。当时我带着学生还在外地实习、参观，等回来后，会计直接告诉我，到学报领工资去。我这才知道，我已被“组织分配”到学报编辑部了。当时说，学报工作需要，好像系里也不好安排我的工作。我自己也想换换地方。有人说，我到学报编辑部做编辑是“三满意”。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就高高兴兴地接受了。1993年10月底，我又被调回到教育系做教师。当时说，是因为教学科研、学科建设需要，我更多的感觉是“叶落归根”了。时至今日，我仍然在“超期服役”，用他们的话来讲，依然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算是“老骥伏枥”，我的学术探索之路延展其中。

我做学报编辑十七年，是指十七年中以做编辑为主业，我的人事编制在学报编辑部。事实上，十七年中我始终没有放弃所学专业，一直在教育系兼课，协助老先生搞科研，带研究生，并自己主持科研项目，招收研究生，只是在教育系不记工作量，不拿任何报酬，被认为是“吃学报的饭，给教育系干活”。几个获奖成果都是在学报做编辑时完成的。1993年调回教育系之后六七年，在教育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还一直兼做学报编辑工作，变成“吃教育系的饭，为学报干活”。我深感，在高校学报做编辑兼职承担一定的教学科研工作任务，教学科研人员兼职承担部分编辑工作，是大有好处的。

1978年6月，我在北师大学报第3期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四人帮”批“智育第一”是对德育智育的全面破坏》。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命题作文，还带有那个时期特有的色彩，算不上什么学术